

拒绝浮躁和脱离国情的极端

【当下小文谈】

□ 叶小文



○叶小文：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、第一副院长，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会长，著名学者，著有《小文百篇》、《多视角看社会问题》、《望海楼札记》等多部著作，本栏目特邀顾问。

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闭幕大会上说，应该“拒绝浮躁和脱离国情的极端主张”。这是句大实话，切中当前社会思潮的要害。

快速发展的中国，难免出现一系列矛盾和问题。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，一切成就用13亿一除，都会变小；一切问题用13亿一乘，都会变大。何况机遇从来与挑战共生，成就往往与问题相伴。

快速发展的中国，难免引起世界关注。有的看中国不顺眼是因为不舒服。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，中国是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情况下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，当冷战随着苏联解体而终结时，中国的社会主义经过改革开放迅猛发展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欲制“遏制中国”之风者大有人在。有的看中国不顺眼则是因为不习惯。中国综合实力提升效应

倍增，一些国家应对我快速发展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明显增强，一些邻国对我戒备心理上升，中国在世界聚光灯下，一举一动都“被曝光”、“被比较”、“被竞争”、“被崛起”。

于是，国外有人喊，国内也有人应，似乎解决当今中国的问题唯有“全盘西化”，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、走西方的发展道路。此论，且不说是别有用心者企图陷中国于万劫不复的陷阱，也是我们必须高度警惕、断然拒绝的“浮躁和脱离国情的极端主张”。

这种极端主张要不得，因其“脱离国情”。洋务运动倡导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，“西化”的决心和行动都很大，但挽回得了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吗？

这种极端主张要不得，因其“浮躁”。不妨比较他国，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土耳其，在现代转型中曾以最大的决心成为“西方文明”的一分子。但土耳其的悲剧恰恰在于，所有这些

都只是土耳其人自己的幻想和一厢情愿罢了。

美国学者莱斯特·R·布朗认为，“由于中国拥有如此庞大的人口，人类至今走过的所有道路对中国都不适合。要不了多久，中国非得开拓一条全新的航道不可。这个发明了造纸术与火药的民族，现在面临一个跨越西方发展模式的机会，向世界展示怎样创造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经济。中国若成功了，就能为全世界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，为人仰慕效法；中国若失败了，所有的人都将为此付出代价。”

中国还要快速发展，问题还会不断出现。“发展之年”往往也是“多事之秋”，我们既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，又要谨慎地对待“多事”，正确地处理“多事”，清醒地“拒绝浮躁和脱离国情的极端主张”。看问题、作判断要善于学习，勤于思考，深入实际，实事求是，力求客观公正；要沉得住气，耐得住烦，静得下心，稳得住阵，方能宁静致远。

【谈古论今】

做族庖、良庖还是庖丁

骨肉筋脉之间的空隙不是人人都能看出来的，因为厨师和厨师不一样，刀和刀不一样，牛和牛更不一样，所以自古处世之道都是大课题。

□ 崔耕和

要论处世哲学，还教《庄子·养生主》说得透彻。说《养生主》可能眼生，可选入中学课本的《庖丁解牛》则让人再熟悉不过，《庖丁解牛》是《养生主》中的重要章节。

庖丁为梁惠王表演宰牛，其过程竟然让人愉悦到如参加上古《桑林》舞会，不由得让梁惠王从内心发出赞叹：“牛，真牛啊！你的技术怎么能达到这样的地步呢？”真是见过宰牛的，没见过宰牛令人这样享受的。

是的，庖丁解牛已经超越了技术层面，达到了物我两忘，游刃有余的哲学境界。庖丁放下刀自豪地对梁惠王说了一通很有见地的话：“良庖岁更刀，割也；族庖月更刀，折也。今臣之刀十九年矣，所解数千牛矣，而刀刃若新发于硎。彼节者有间，而刀刃者无厚，以无厚入有间，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。”这话直白一点说就是：技术好点的厨师每年换一把刀，因为他用刀子割肉；一般的厨师每月换一把刀，因为他用刀子砍骨头。我这把刀用了十九年而刀刃却像刚从磨石上磨过一样。牛的骨节是有空隙的，而刀锋并不厚，以薄的刀锋进入有空隙的骨节，这样才能游刃有余。

如果我们把厨师比做芸芸众生，把厨刀比做人的生命，那么，处世之道就有了三种：一种是族庖，他们与世间之牛硬碰硬，生命之刀仅用一个月就坏了，这等于自戕性灵；更多的一种是良庖，他们遇事想办法，不盲目冲动，因此生命之刀用的时间也较长。最可取也最难企及的当然是庖丁之法了。他遵从规律，在生活的骨肉筋脉之间寻找空隙，让生命之刀在复杂交错中始终游刃有余。当心境界超越了技巧，出神入化自在情理之中了。应该说，庖丁之法既是做事之法，更是做人之道。

在近代风云人物中，能得庖丁之法的当数晚清重臣张之洞了。平心而论，李鸿章、左宗棠等人与张之洞比起来，差不多是“良庖”与“庖丁”的区别。

清朝晚期，山雨欲来，风雨飘摇，当许多人朝不保夕的时候，张之洞却处得风生水起，得心应手。他经常据理直谏，却从未因此而失了顶戴花翎。1875年，四川东乡县孙定扬造例暴敛，激起乡民众怒，可孙知县却反咬一口，诬民造反。四川提督又偏听偏信，率兵烧屋毁寨，残杀无辜400余人，酿成特大冤案。因此案涉及慈禧特别宠信的四川总督吴棠，所以无论朝野如何不平，就是不好结案。最后张之洞出面了，他绕开吴棠，将直接责任人定罪，结果事件平息，冤案昭雪。深谙庖丁之法的张之洞，不仅没在这块盘根错节的大骨头上折刀，反而得了能臣的称号。你看，“以无厚入有间”，自然游刃有余。

话说回来，骨肉筋脉之间的空隙不是人人都能看出来的，因为厨师和厨师不一样，刀和刀不一样，牛和牛更不一样，所以自古处世之道都是大课题。可人活一世，刀仅一把，生命易朽，刀刃易折，又不能不让人不断地学习。到底是做族庖、良庖，还是做庖丁，这既是个生活问题，更是个哲学问题，不可不慎，更不得不思。

牟宗三：融汇中西文化，阐扬三教慧命



“教一辈子书，不能买一安身地。只写了一些书，却是有成，古今无两。”此语一出，横扫千军，令学术界相当错愕。牟宗三果真可以与孔子相提并论，作为一古一今山东学人的代表吗？

□ 颜炳罡

牟宗三，山东栖霞人，生于1909年，卒于1995年，是中国现代最富有原创性的哲学家，当代新儒学的著名代表人物。

山东，人杰地灵，人才辈出，早已见诸史册。在20世纪的中国，山东也不让于秦楚燕赵，傅斯年、季羨林、任继愈等等，皆为名满天下的学术宗师。牟宗三，出生于山东，辗转于大江南北，漂泊于海外，成名于港台，除少数数学界专家、学者外，鲜有知者。

不过，在港台地区，牟宗三的名声可谓昭如日月。1974年，牟宗三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，师孔子晚年归鲁之意，返台讲学，立即引起台湾学术界的极大轰动。尤其是《联合报》以《文化建设道路》为题，为牟宗三量身打造的公众演讲，更是引起朝野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。听讲者从台中、台南等地纷纷乘车北上，赶赴台北，既有锐气十足的青年学生，也有白发苍苍的专家、教授，时任台湾地区“行政院长”的孙运璿也到场听受。

1993年春天，我赴杭州出席马一浮国际学术研讨会，会间有位杭州的老先生知道我是从山东赶来开会的，就主动对我说：“你们山东真了不起，前有孔夫子，后有牟宗三。”作为山东人，从外省人口中得到这样的赞誉，令人兴奋！这位学者竟然将牟宗三与孔子并列在一起，视为山东学人一古一今的代表，很值得回味！

1987年秋季起，德国波昂大学哲学系开设“牟宗三哲学课”，中国现代哲学家的哲学学说进入西方人哲学殿堂，牟宗三为第一人。牟宗三的学术著作已经被译为英、德、法、韩等多种文字。

1994年12月，牟宗三已过85岁高龄，因病住进了医院，回顾一生，在病床上他写下这样几句话，开示蔡仁厚、王邦雄等门人：“你们这一代都有成，我很高兴。我一生无少年运，无青年运，无中年运，只有一点老来运。无中年运，不能飞黄腾达，事业成功。教一辈子书，不能买一安身地。只写了一些书，却是有成，古今无两。”这段话完全可以看做牟先生对其一生的总结，从其总结中，我们可以窥见牟先生的落寞与自负。

“只写了一些书，却是有成，古今无两。”此语一出，横扫千军，令学术界相当错愕。结



牟宗三

合前面提到的那位杭州学者的看法，牟宗三果真可以与孔子相提并论，作为一古一今山东学人的代表吗？

牟宗三自20多岁开始著述，到86岁生命结束，在其60多年的学术探索中，给后人留下了近30部学术著作，内容涉及易学、逻辑学、哲学认识论、康德哲学、宗教学、原始儒学、佛学、道家与玄学、宋明理学、历史学、政治学等领域。一生著述，古今无两，不是说牟宗三著述最多，也不是说他学术领域涉及面最广，而是说他的著作涉及哪个领域，就会在哪个领域立下一块界碑，达到那个领域前人所未达到的深度与高度。

牟宗三是中国现代最富有原创性的哲学家，他建立的“道德的形上学”哲学体系是现代中国哲学重建的标志。牟宗三是为哲学而生的，他的生命是哲学的生命，他的心灵是哲学的心灵。他一生从事哲学的学习、教学、研究，其生命历程就是一部展开的哲学大书，是一层层推进的哲学体系。他长期出于于怀特

海、罗素、康德、黑格尔、柏拉图等西方大哲之间，又浸润于原始儒学、宋明理学、佛学、道家与玄学等中国哲学之门，融合中西而超越中西，继往圣之绝学又再造往圣之学，顺应中国哲学的义理方向，师法西方哲人逻辑思维、概念思维之方式，熔中西哲学于一炉，建立起博大精深之“道德的形上学”哲学体系。《现象与物自身》、《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》、《圆善论》等是其中代表作。

牟宗三以一己之力将康德的“三大批判”即《纯粹理性批判》、《实践理性批判》、《判断力之批判》翻译为中文。尤为可贵的是，翻译“三大批判”旨在消化“三大批判”、融合无二人。即使牟宗三自许比康德更了解康德，也非虚语，他站在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实践哲学的角度看康德，可以更透彻地看清康德哲学的意义、价值与不足之处。牟宗三以《认识论之批判》、《现象与物自身》消化康德之《纯粹理性批判》，以《圆善论》消化其《实践理性批判》，以《真善美之分别说与合一说》消化康德之《判断力之批判》。

牟老贯通儒释道三家义理慧命，将中国哲学研究提升到新境界。

牟宗三是位有着强烈现实关怀的哲学家，他一直关心国家、民族的命运，关心中国文化的命运。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，他曾用十多年的时间，探讨中西文化根本精神之异同、中国文化未能走上科学民主之故，探讨如何才能消化西方文化，实现中国文化的再造。在其著作中，牟先生提出著名的道统、学统、政统的“三统并建”说。道统即承续中国文化之道统，以维护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；学统即科学之统，政统即民主政体之统，学统与政统是西方文化之所长，“三统并建”即中西文化之融合，也是儒家人文主义的彻底透出。

牟宗三先生认为，儒学已经完成两期之发展，现在将转入第三期之发展。自孔子创立儒学起到董仲舒完成创制建国，代表了儒学第一期之发展；宋明理学以儒学为主位，消化印度佛学，重建义理系统，代表了儒学第二期之发展；现在儒学转入第三期之发展。儒学第三期之发展就以儒家的道统为主体，消化西方文化，完成道统、学统、政统的再造。

（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原文刊登在《儒风大家》）

编辑徐静 美编马晓迪